

民族交往的语言表现： 新疆汉语方言中的维吾尔语借词使用研究

王远新

[提要] 本文讨论借词与语码夹杂、借用类型与借用关系、第二语言熟练程度与词语借用、借词类推与扩散、对待借词的态度与借词使用、语言规范与社会使用6方面的问题。研究表明,受不同社会特征语言使用者及交际对象、话题、语体和场合等因素影响,新疆汉语方言中维吾尔语借词使用及其相关语言态度呈现一定社会差异。随着普通话推广,新疆汉语方言的使用群体和范围逐渐缩小,但仍有活力,一些维吾尔语借词具有较强构词能力和类推功能。借词不仅体现了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语言生活状况及语言的地方特色,还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语言使用者对不同语言文化的认同、吸收和兼容。

[关键词] 新疆汉语方言 维吾尔语借词 使用差异 语言态度

新疆汉族和少数民族密切接触、语言相互影响,最直接的体现是词语互借。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也是新疆各民族的族际交际语;维吾尔语分布区域广、使用人数多,在一些地区属区域强势语;新疆汉语方言主要分兰银官话北疆片和中原官话南疆片,是不同地区和群体的族际交际语。不同地区民族分布、人口结构及同一地区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差异,导致新疆汉语方言中维吾尔语借词数量、使用及语言使用者态度存在差异。

一 调查情况与研究目的

(一) 调查对象

口语交流是借词传播和扩散的重要途径。为了解新疆不同地区和民族语言使用状况、语言态度及语言关系,2006-2008年,我们在7市4县^①进行了4个半月的调查,新疆汉语方言中的维吾尔语借词使用及语言态度是该调查的组成部分。本文依据9个调查点的材料撰写^②,

^① 南疆喀什地区喀什市、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阿克陶县,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北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州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哈巴河县;东疆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市;乌鲁木齐市。

^② 调查对象分布:喀什地区行署公务人员36人、库尔勒市公务人员42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察布查尔镇政府公务人员29人、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公务人员27人、吐鲁番市公务人员44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明园社区居民48人、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务人员38人、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务人员37人、新疆人民出版社工作人员40人,合计341人,其中南疆78人,北疆56人,东疆44人,乌鲁木齐市48人,自治区直属单位115人。调查对象年龄均按调查时间计。

问卷调查对象基本信息见表 1 和表 2^①。

表 1 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 (n=341, 人/%)

性别		年龄段			受教育程度	
男	女	青年组	中年组	老年组	低等组	高等组
184/54.0	157/46.0	112/32.8	140/41.1	89/26.1	61/17.9	280/82.1

表 2 民族成分 (n=341, 人/%)

汉族	维吾尔族	回族	哈萨克族	蒙古族	柯尔克孜族	锡伯族	乌孜别克族	其他民族
136/39.9	103/30.2	22/6.5	32/9.4	17/5.0	4/1.2	16/4.7	6/1.8	5/1.5

(二) 调查词项

新疆汉语方言中的维吾尔语借词主要有音译、意译、汉语和维吾尔语合璧词 3 类。本研究在文献和词典筛选及摸底调查基础上, 选取 16 个典型借词作为调查词项。具体见表 3。

表 3 调查词项 (n=16)

音译词 (12个)	名词(单纯词)	皮芽子 (pijaz): 洋葱; 卡瓦普 (kawap): 烤肉; 巴扎尔 (bazar): 集市。
	名词(词干+构形)	巴郎子 (bala 孩子、男孩、儿子 + njiz 尊称第二人称领属成分 > balinjiz): 男孩、孩子、儿子、小伙子; 洋岗子 (jenge 嫂子 + njiz 尊称第二人称领属成分 > jenginjiz): 女人、已婚妇女、媳妇、老婆子; 牌档子 (pajda 利益、好处 + njiz 尊称第二人称领属成分 > pajdenjiz): 利益、好处、油水。
	形容词或副词	拿斯 (nes 倒霉、背时): 差劲的、不好的、素质不高的、下贱的 ^② ; 索拉希 (solaf): 差劲的、某方面不行的、扶不上墙的; 马里马唐 (malimataj 繁杂、糊里糊涂、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乌烟瘴气、杂乱): 关系不正常的、不清不白的。
	副词	艾来拜来 (elej-belej 滴里嘟噜): 啰里啰嗦 ^③ 。
	副词(变音)	艾来来拜来来 (“艾来拜来”的强调形式): 啰里啰嗦。
	副词(词干+构形)	海买斯 (hemme 全部、所有 + si 第三人称领属成分 > hemmisi): 全部、所有。
意译词 (3个)	肚子胀 (qo(r)saq kópif 腹胀, 主谓短语): 生气、憋气; 眼睛小 (közü kifik 眼睛小, 主谓短语): 小气、吝啬、抠门、小心眼 (形容词); 黑肚子 (qara qo(r)saq, qara 黑色的、大的, qo(r)saq 肚子, 偏正短语): 没文化的、愚昧的 (形容词), 大老粗、乡下佬 (名词)。	
合璧词 (1个)	胡里马唐 (由汉语“糊里糊涂”前半部分和维吾尔语 malimataj 后半部分 -mataj 复合而成): 随随便便的、胡乱的 (主要作形容词, 也可用作副词)。	

^① 调查以公职人员为主, 兼及社区民众, 因此受教育程度“高等组(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较高; 民族成分中的“其他民族”包括满族 2 人, 塔塔尔族 2 人, 撒拉族 1 人, 因样本量小, 统计分析时忽略不计。

^② 新疆汉语方言的“拿斯”与阿拉伯语借词 nes 音同义近, 有人认为是维吾尔语 nas (蒜叶、柏树灰、石灰等混合制成、含在嘴里咀嚼的烟, 类似鼻烟) 的引申义, 维吾尔标准语为 nasval, 喀什土语为 nas。乌鲁木齐汉语方言有描述几类物件的俗语“搪瓷碟子细泥碗, 拿斯葫芦烟锅杆”。

^③ 艾来拜来 (elej-belej) 的来源尚无一致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02:83) 认为, 它是维吾尔语 al-ber (拿-给) 的音译形式; 徐思益等 (1997:18) 认为, 它是维吾尔语俗语 ala-bula 的音译形式, 或可能是哈萨克语 alaj-bulaj (这样-那样) 的音译形式。据笔者观察, 内蒙古阿拉善盟 (兰银官话区) 常用这种形式表示“啰里啰嗦”; 青海安多藏族地区和海西蒙古族地区汉语方言常用“阿拉巴拉”表示“啰里啰嗦”。以上现象是西北回族汉语扩散的结果, 还是不同语言或方言共性, 尚需进一步考证。

词项选择说明：第一，选择日常生活典型借词。梳理文献、方言词典收录的方言借词，排除5类：①行业词语，如“热瓦普、弹拨儿、都塔尔（乐器名）、达瓦孜（走钢丝表演）”等；②宗教词语，如“乃玛孜、阿訇、毛拉、伊玛目”等；③进入普通话的词语，如“馕、肉孜节、库尔班节”等；④知晓率较低词语，如“嘎得麻西（qadirmaq 乱糟糟的、各式各样的）”；⑤专有名词，如人名、国名、地名等。第二，兼顾借词类型。新疆汉语方言中的维吾尔语借词以音译为主，选择的词项也以音译词为主，兼顾意译词、汉语与维吾尔语的合璧词。第三，词源界定。部分词项源头是阿拉伯语（如“卡瓦普、巴扎尔、牌档子、海买斯、拿斯”）和波斯语（如“皮芽子”），因均为汉语方言从维吾尔语借入，本文将其看作维吾尔语借词。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综合运用实地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从两方面调查借词使用：第一，知晓率、使用率和常用率（可简称“三率”）。“知晓”不等于“使用”，“使用”不等于“常用”。“常用”指维吾尔语借词比汉语原有词更常用，即汉语已有又从维吾尔语借用的词语，其使用存在选择性。第二，借词使用及语言态度的社会差异。主要考察不同地区的不同群体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交际对象和话题使用借词的共时差异，动态观察借词使用特点；分析调查对象对待借词及其使用的态度，揭示语言使用者的文化交际心理。在此基础上，讨论语言接触和借词的几个理论问题。

二 借词知晓和使用差异

9个调查点借词“三率”的总体规律为：1) 知晓率 > 使用率 > 常用率。2) 不同类型借词的“三率”呈正相关分布，即知晓率高的借词，使用率和常用率也较高。3) 借词使用率和常用率差异除受知晓率影响外，还与“皮芽子”是新疆各民族常用食材、“马里马唐、艾来拜来来”分别是“胡里马唐、艾来拜来”的变体形式、“黑肚子、索拉希”的贬义色彩有关。

（一）借词“三率”的社会差异

1. 性别和民族差异

1) 性别差异。男性的“三率”均高于女性，少数调查点例外（见表4）。新疆人民出版社36岁哈萨克族女性强调：“有些词男人用得更多，女人用得比较少，比如‘肚子胀’等。”

表4 知晓率、使用率和常用率的性别差异

调查点 (n=341)	知晓率	使用率	常用率
喀什地区行署 (n=36)	男>女	女>男	男>女
库尔勒市 (n=42)	女>男	男>女	男>女
察布查尔镇 (n=29)	女>男	男>女	女>男
哈巴河县 (n=27)	男>女	男>女	男>女
吐鲁番市 (n=44)	男>女	男>女	男>女
乌市明园社区 (n=48)	男>女	男>女	男>女
自治区民委 (n=38)	男>女	男>女	男>女
自治区民语委 (n=37)	男>女	男>女	男>女
新疆人民出版社 (n=40)	男>女	男>女	男>女

2) 民族差异。少数民族的“三率”高于汉族；少数民族中，维吾尔族知晓率高于其他民族，使用率和常用率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农业民族的“三率”高于牧业民族。吐鲁番市 40 岁维吾尔族男性公务人员指出：“像‘艾来拜来、胡里马唐’这类词，回族人用得较多；像‘索拉希’这类词男人比女人用得更多。”库尔勒市 50 岁汉族女性公务人员认为，“拿斯”这样的词回族较常用，汉族用得少，主要是“老新疆人”用；维吾尔族基本不用，除非开玩笑。她强调：“‘海买斯’这样的词是汉族和回族说维吾尔语发音不标准造成的，维吾尔语不这样发音，维吾尔族之间说汉语时一般不用这类词。”吐鲁番市 50 岁维吾尔族女性公务人员解释：“‘牌档子’这样的说法，我一般都是去‘巴扎尔’时和汉族或回族摊主用，其他情况一般不用。”

2. 年龄差异

中老年组借词知晓率明显高于青年组，不同年龄组的借词使用率和常用率有交叉，但总体是老年组高于中青年组。“老新疆人”比入疆时间短的人及新疆出生长大的年轻人更多知晓和使用借词。年轻人借词知晓和使用有差异：较早踏入社会的比学历较高的及在校生更多知晓并使用借词。一些中学生知晓率和使用率都很低。乌鲁木齐市明园社区一位哈萨克族高三男生从小上汉语授课学校，其爷爷是哈萨克族，奶奶是维吾尔族，妈妈是柯尔克孜族，他不知晓绝大多数借词。从整体趋势看，年龄越小，借词知晓率和使用率越低。一些调查对象指出，1980 年代前后，新疆人说汉语夹杂维吾尔语借词现象比较普遍，因为少数民族汉语水平不高，双方需互相迁就。随着外来人口增加、教育普及和少数民族汉语水平提高，借词使用逐渐减少。乌鲁木齐市明园社区 40 岁汉族女性（大专学历）解释：“我在南疆工作过，会说维吾尔语，但现在我的维吾尔语基本没有了当年那种用武之地。1980 年代时，少数民族的汉语水平不高，在民族杂居地，人们说汉语时经常夹杂维吾尔语词。现在，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的汉语说得都很好，说汉语夹杂维吾尔语词的现象也不如从前多。”自治区民委 37 岁维吾尔族女性（吐鲁番市出生）认为：“有些说法老年人更常用，年轻人普通话水平提高后很少使用。”具体见表 5。

表 5 知晓率、使用率和常用率的年龄差异

调查点 (n=341)	知晓率	使用率	常用率
喀什地区行署 (n=36)	老>中>青	青>中>老	老>青>中
库尔勒市 (n=42)	老>中>青	老>青>中	老>青>中
察布查尔镇 (n=29)	老>中>青	老>中>青	青>中>老
哈巴河县 (n=27)	老>中>青	中>老>青	中>老>青
吐鲁番市 (n=44)	中>老>青	中>老>青	中>老>青
乌市明园社区 (n=48)	中>老>青	青>中>老	中>青>老
自治区民委 (n=38)	老>中>青	老>中>青	老>中>青
自治区民语委 (n=37)	老>中>青	青>老>中	青>中>老
新疆人民出版社 (n=40)	老>中>青	老>中>青	老>中>青

3. 地域和出生地差异

总体而言，以维吾尔族为主的民族杂居区，借词的“三率”高于其他地区；南疆和东疆地区高于北疆地区；农村地区高于牧区。不同出生地调查对象借词的“三率”虽有交叉，但

总体是新疆出生的高于疆外出生的。疆外出生者中，入疆时间与借词的“三率”呈正相关，即到新疆时间越长，“三率”越高。新疆人民出版社36岁回族女性（天津出生，1973年入疆）不知道16个词项中的6个；33岁汉族男性（甘肃出生，2001年入疆）不知道16个词项中的9个；个别到新疆时间较短的调查对象甚至不知道“皮芽子”为何物，而新疆土生土长和入疆时间较长的，即使听说或知道汉语词“洋葱”，也更常用“皮芽子”。详见表6。

表6 知晓率、使用率和常用率的出生地差异

调查点 (n=341)	知晓率	使用率	常用率
喀什地区行署 (n=36)	市内>疆外>疆内	疆外>市内>疆内	疆内>市内>疆外
库尔勒市 (n=42)	疆内>市内>疆外	疆内>市内>疆外	疆内>疆外≈市内
察布查尔镇 (n=29)	县内>疆内>疆外	疆内>疆外>县内	县内>疆内>疆外
哈巴河县 (n=27)	疆内>县内>疆外	疆内>县内>疆外	县内>疆外>疆内
吐鲁番市 (n=44)	市内>疆外>疆内	市内>疆外>疆内	疆外>市内>疆内
乌市明园社区 (n=48)	疆内>疆外>市内	疆内>市内>疆外	疆内>市内>疆外
自治区民委 (n=38)	疆内>市内=疆外	疆外>疆内>市内	疆外>市内>疆内
自治区民语委 (n=37)	疆外>市内>疆内	市内>疆外>疆内	市内>疆内>疆外
新疆人民出版社 (n=40)	市内>疆内>疆外	市内>疆内>疆外	疆内>市内>疆外

4. 受教育和双语熟练程度差异

少数民族双语熟练程度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双语熟练程度越高。从地区看：城市>乡镇>农村>牧区；首府>北疆>东疆>南疆。从民族分布看：散居区>杂居区>聚居区。借词知晓率虽与受教育和双语熟练程度关联不明显，但使用率和常用率与其有显著相关性，即越是熟练的维一汉双语人，借词使用数量、使用频率和场合越少；越是维一汉双语熟练程度不高的人，越容易使用借词，词语夹杂或语码混用现象也比较普遍。

自治区民委46岁维吾尔族男性（拜城县出生）指出：“我在和文化层次低的人、普通老百姓交谈时会用‘牌档子’这样的词，和政府人员、同事交谈时一般都会用‘好处’。”吐鲁番市50岁维吾尔族女性公务人员知道“马里马唐”的各种意思和用法，但从来不用，她解释：“这样的词老年人和农村人用得比较多，属于维吾尔族说汉语时的‘土话’。”新疆人民出版社36岁柯尔克孜族女性说：“‘黑肚子’这样的词主要用于口语，是土话，指‘文盲、没有文化的人’。我和文化程度低的人说话时，不知不觉也会使用这样的土话。”在一些调查点，新疆出生者借词知晓率和使用率高于疆外出生者，常用率则相反，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上述结论。吐鲁番市43岁回族男性公务人员（市内出生）解释：“我们的维一汉双语不熟练，说汉语时夹杂一些维吾尔语词，可以更准确地表达意思。维吾尔族有‘认话不认人’的特点，说汉语时夹杂几个维吾尔语词，容易和当地少数民族沟通，也能够融洽谈话气氛。”

综上所述，新疆汉语方言中维吾尔语借词的知晓率、使用率和常用率主要受性别、年龄、出生地和双语熟练程度等社会变量影响。

（二）交际对象、话题、语体和场合差异

借词使用与交际对象、话题、语体和场合有关，总体规律是：不同民族之间>本民族内部；维吾尔族、汉族、回族之间>其他民族成员之间；熟人朋友之间>陌生人之间；男性之

间>女性之间；男性之间>男女性之间；随意话题>正式话题；开玩笑>严肃话题；非正式语体>正式语体；非正式场合>正式场合。上述指标有些存在负相关，如在正式场合，话题和语体都比较正式，借词使用率比较低，相反则比较高。

部分调查对象强调，一些词语和表达方式一般不在正式场合使用，在非正式场合如朋友聚会、熟人开玩笑时常用。吐鲁番市 48 岁维吾尔族男性公务人员强调：“‘洋岗子’这个词，我以前在农村工作时常用，但到市政府工作后就不再用了。”库尔勒市 35 岁维吾尔族男性公务人员解释：“‘海买斯’这样的词我从小就知道，但一般不用，乡下人常用；‘索拉希’这样的词一般开玩笑时才用。”自治区民委 32 岁汉族男性公务人员（疏勒县出生）表示，在正式场合一般不会用“肚子胀”，在比较随意或开玩笑的场合才用；“胡里马唐”这样的词南疆比北疆使用广泛。他知晓“艾来拜来”的确切含义，但很少用，因为“感觉是土话，不好听”。

从交际对象看，借词使用具有层次性。第一层，跟熟人和陌生人：熟人>陌生人；第二层，跟不同民族熟人：汉族>少数民族；第三层，跟家人，视交际对象的社会特征而定。

从民族成分看，少数民族间使用借词比例高于跟汉族交谈。自治区民委 25 岁蒙古族男性（博乐市出生）解释：“‘马里马唐’这个词我很早就知道，上小学前就会用，但现在很少用，农村人用得比城里人多；‘海买斯’这个词主要和少数民族朋友交谈时使用；‘卡瓦普’这个词主要和少数民族使用，与汉族更愿意用‘烤肉’。”自治区民委 29 岁哈萨克族男性（阿勒泰市出生）指出：“我原来不知道‘索拉希’，后来和维吾尔族接触多了才知道它的意思，有时也会用；‘海买斯’这个词我主要和少数民族用。”察布查尔镇政府 38 岁汉族女性公务人员（当地出生）借词知晓率和使用率都比较高：“像‘皮芽子’一类借词已经融合到新疆汉语中，有些借词一般是乡下用得比较多，或者和年龄较大的少数民族说话时才用。我在单位和同事聊天一般都会说‘他上街买东西去了’，下乡会说‘他巴扎尔买东西去了’。对年龄比较大的、汉语不好的少数民族，我会用‘你肚子不要胀’，对汉语比较好的少数民族一般说‘你不要生气’。”新疆人民出版社 36 岁柯尔克孜族女性表示：“我跟少数民族交往比较多，更常用‘卡瓦普’，一般不用‘烤肉’。”自治区民委 34 岁汉族男性（喀什市出生）强调：“‘黑肚子’这样的词我和回族朋友交往时常用，和其他民族用得不多。”

三 对待借词及其使用的态度

（一）几种不同的语言态度

1. 积极和消极态度

部分调查对象包括受教育和双语熟练程度较低的维吾尔族对借词使用多持积极态度。他们知道全部或部分调查词项，日常生活中也常用。乌鲁木齐市明园社区 27 岁乌孜别克族女性（社区幼儿园教师），母亲是维吾尔族，父亲是乌孜别克族，她从小就知道全部调查词项，在日常交流中也会使用其中的大部分。她认为：“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词，形象生动，表意准确。”

持消极态度的多为受教育及双语熟练程度较高的调查对象。他们虽知道全部或绝大部分调查词项，但很少使用，只是与熟人和朋友交谈或开玩笑时偶尔使用。自治区民委一位维吾尔族调查对象看了问卷后，批评设计不合理，反对问卷收入不规范、影响语言纯洁的词语。一位维吾尔族调查对象甚至建议这项调查应在百姓阶层进行，因为只有那些两种语言都不熟练的人，才喜欢使用这种“半吊子话”。自治区民委 25 岁塔塔尔族女性公务人员（伊宁市出

生)表示:“不应使用这些借词和不规范的句子,语言使用应该规范化,让语言更纯净些。”

总之,持积极态度者主要立足于交际心理和表达功能。从交际心理看,使用这些借词能够拉近谈话双方的距离,融洽和活跃谈话气氛;从表达功能看,它们生动形象、幽默风趣,语言感染力强,能够体现地方语言特色。持消极态度者主要立足于语言纯洁化和标准化,体现的是语言情感和规范化意识。

2. 中立态度

部分调查对象的态度比较客观,认为词语借用是社会文化发展的正常现象。自治区民语委49岁汉族男性(山东出生,1976年入疆)认为:“南疆少数民族占90%以上,汉族干部也会讲维吾尔语;乌鲁木齐汉族占多数,少数民族‘汉化’程度高,都会说汉语。汉语夹杂维吾尔语借词,是社会和语言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正常现象。”吐鲁番市34岁汉族男性公务人员(江苏徐州出生)认为:“使用这些词语比较形象,像‘胡里马唐的话不说’这类表达方式就很生动,当地回族使用得更普遍,它体现了维—汉文化的交融。”乌鲁木齐市明园社区39岁汉族女性(山东青岛出生,1993年入疆,高中文化,曾在库车县生活两年,个体经营者)已用“皮芽子”和“巴扎尔”替代了她刚到新疆时习惯使用的“洋葱”和“市场”,她认为,“这类词能反映当地文化,能融洽与少数民族的谈话气氛,增加亲和力”。

3. 从众心理

汉语中维吾尔语借词和维吾尔语中汉语借词的调查均表明,部分调查对象对待借词及其使用表现出从众心理。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维吾尔族原本不知道一些词是本族语还是借词,词语的选择和使用基本从众。在调查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时,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和平路街道办事处药王庙社区油库巷39岁男性(小学文化)问道:“dango ujkurʃe sözmu? tort degentʃu?”(dango“蛋糕_{汉借}”这个词是维吾尔语吗? tort“蛋糕_{俄借}”呢?)部分人即使知道是借词,也持无所谓态度,“别人都这样用,我就跟着用”。他们在使用维吾尔语时会无意识地用汉语词替换母语词。新疆师范大学42岁维吾尔族男性电工(高中文化)谈及工作条件时说:

- (1) gawwej ʒɨntije-ni qof-qan-da, ku-la-jdikan-ni
 岗位_{汉借} 津贴_{汉借-宾格} 加合-过去时形动词-方位格 扣_{汉借}-动词构词词缀-现在时形动词-宾格
 ku-la-p, ikki miñ koj-ka bar-i-du-Ø.
 扣_{汉借}-动词构词词缀-副动词 二 千 块_{汉借}-方向格 达到-现在时-后知语气-3单
 算上岗位津贴,该扣的扣完后,差不多两千元。

谈及上学经历,他使用了“tʃuji(初一_{汉借}), tʃu er-ge(初二_{汉借}-方向格) tʃiq-qan-da(上-过去时形动词-方位格)”的表达方式。当他意识到调查者意图后解释:

- (2) qandaq qil-i-miz? baʃqi-lar mu fundaq de-wat-sa-Ø, bu söz-ler-ni
 怎样 做-现在时-1复 其他-复数 也 如此 说-现在进行时-条件式-3复 这 话语-复数-宾格
 xenzu-tʃe de-jdikan bol-up ket-tu-q.
 汉族_{汉借}-构词词缀 说-现在时形动词 是-副动词 助动词-单纯过去时-1复

如果其他人都这样说,我们怎么办?这些词语我们现在都用汉语说。

(二) 受教育和双语熟练程度对语言态度的影响

受教育和双语熟练程度对语言态度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维吾尔族公务人员、教师、出版和翻译等专业工作者借词知晓率普遍较高,但使用数量、频率、范围一般都低于普通民众,且部分调查对象对借词及其使用的态度比较消极。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1. 社会身份和语言情感意识

不少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认为，说汉语时过多使用维吾尔语借词，是双语能力差、文化程度低的表现，会降低文化层次。这些汉语化的借词是维吾尔语语音、语义的扭曲形式，只有那些社会地位低的人才常用。“洋岗子、索拉希”一类借词不雅；“黑肚子”一类借词比较生硬，应选用更文明的词语替代。维吾尔语 jenge “嫂子”借入新疆汉语方言后，不仅连同语法变化形式一起借用，语义也产生了泛化。这种语义泛化不太礼貌，是懂维吾尔语的汉族和汉语水平低的维吾尔族乱用的结果。吐鲁番市 36 岁维吾尔族女性公务人员（伊宁市出生）强调：“‘牌档子’这样的词语一般都是买卖人做生意时用得比较多。如果平时用，会让人觉得没礼貌。”自治区民委 37 岁维吾尔族女性（吐鲁番市出生）认为：“有些说法不太礼貌，比如‘洋岗子’，我们一般不用。如果文化程度高的人用了，我们会觉得他没素质。”

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看法。自治区民语委 52 岁塔塔尔族男性（阜康市出生）不仅极力反对使用借词，而且认为只有不懂维吾尔语的汉族或不懂汉语的维吾尔族才会用。在他看来，只有两种语言都不熟练的人才用这种方式说话，“如果是汉语水平很高的人，你跟他用到这些借词，他会感到很不舒服，觉得不尊重自己，而且还会提醒对方‘好好说话’。”新疆人民出版社 30 岁锡伯族女性认为：“男同志更常用‘肚子胀’，女同志更常用‘生气’。‘牌档子’是老词，过去用得比较普遍，现在多是些文化程度低或汉文水平低的人才用。”自治区民语委 49 岁汉族男性（山东出生，1976 年入疆）解释：“像‘黑肚子’这类词，文化层次较低的人才用。”吐鲁番市 42 岁汉族女性公务人员指出：“‘洋岗子’这样的词语有不大尊重人的感觉。”自治区民委 32 岁汉族男性公务人员（疏勒县出生）指出：“‘巴郎子’借入新疆汉语后，意义有所扩大，多用于统称少数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年轻人，有些场合使用不太礼貌，维吾尔族会反感，认为这是不懂维吾尔语原义乱用的结果。”

2. 语言规范化意识

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语言规范化意识比较强，他们强调学汉语只学标准普通话，不会刻意学当地汉语方言。许多少数民族能够或基本能听懂新疆汉语方言，但部分调查对象的自报程度偏低，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们对新疆汉语方言的态度。喀什地区行署一位维吾尔族女性公务人员强调：“我和本族人只讲维吾尔语，和汉族只讲汉语。说维吾尔语就好好说维吾尔语，说汉语就说标准汉语，没必要在汉语中夹杂维吾尔语词。”喀什地区行署 49 岁维吾尔族男性（鄯善县出生）知道全部词项，但使用率不高，他认为“汉语中的这些借词不规范，文化层次低的人才说，文化层次高的人应该讲标准汉语”。一些年长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表示，他们小时候经常接触或使用当地汉语方言，使用过维吾尔语借词，但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会逐渐向普通话靠拢，就有意识放弃了这些借词。

（三）性别对语言态度的影响

男性维吾尔语借词的“三率”普遍高于女性，特别是使用率和常用率。不少女性对“拿斯、索拉希、洋岗子”等词的语感是“土气”“俗气”，听着别扭，不愿使用。有调查对象介绍，“黑肚子、索拉希”这样的词过去用过，工作后一般不用。乌鲁木齐市明园社区 30 岁维吾尔族女性（市内出生，本科文化）解释：“‘牌档子’这个词我小时候不懂，也不会用，长大后学会使用。它是维吾尔语音译词，我过去用得比较多，上大学特别是工作后一般不会再用，因为觉得有些‘土气’。”乌鲁木齐市明园社区 39 岁汉族女性（山东青岛出生，1993 年入疆）虽然知道但不习惯使用“洋岗子、黑肚子”这类词，“因为这些词给人一种生硬的感觉”。

总之,一些借词的借用形式和语义色彩及其使用,能够体现语言使用者的文化价值判断。那些本族语已有仍从其他语言借用的词语,常与本族语原有形式产生竞争,其扩散的可能性和扩散速度也与语言使用者的文化价值取向有关。即借用总有“凭据”,其语义指向、修辞和表达效果,反映了说话人对其赋予的文化内涵,体现了语言交际的文化心理。因此,对借词的认同度和接受度,直接影响着不同社会群体的借词使用情况。

四 对借词及其使用态度的认识

(一) 借词和语码夹杂

以往研究多以书面语或标准语为对象,较少关注口语或方言土语中的词语借用、变化和扩散特点。语言接触导致词语借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入本族语系统的借词;二是语码夹杂中的词语夹杂。借词又分两类:一是“你有我无”,即从外族语借用本族语缺失的词语;二是本族语已有仍从外族语借用的词语。语码夹杂也分两类:一是“临时夹杂”,即为交际方便或达到特定交际效果有意识夹杂外族词语;二是在特定交际语境中无意识、有规律地夹杂某类词语,这类词语和借词的界限很容易混淆,或者说它们最有可能成为借词。

就新疆汉语方言、新疆地方普通话和维吾尔语的相互影响看,首先应区分临时语码夹杂和有规律的语码夹杂。比如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药王庙社区44岁维吾尔族女性(高中文化)问卷调查之余与旁边维吾尔族男性谈起子女状况,她想让儿子参军,但解释说:

(3) mundaq fubej bol-up ket-se-Ø bol-a-m-du-Ø? 如此腐败怎么能行呢?

如此 腐败_{汉语} 是-副动词 助动词-条件式-3单 行-现在时-疑问语气词-后知语气-3单

笔者问及能不能一起吃晚饭,40多岁维吾尔族男性(小学文化)说:

(4) araq iŋ-se-m, nanfy bo-p ket-ti-Ø. 我一喝白酒就难受。

白酒 喝-条件式-1单 难受_{汉语} 是_{汉语}-副动词 助动词-单纯过去时-3单

例(3)中的 fubej“腐败”是名词夹杂,有可能获得借词身份;而例(4)中的 nanfy“难受”则是临时词语夹杂。又如对新疆师范大学维吾尔族教师玩扑克牌时的隐蔽录音材料^①:

(5) mæn-de ɖɣyp bol-kan bol-sa-Ø, sabudo bol-ar-ti-Ø.

我-方位格 对子 有-过去时形动词 助动词-条件式-3单 差不多_{汉语} 是-或然形动词-单纯过去时-3单

如果我有对子的话,差不多就赢了。

(6) ular-da tijenwu bar emes mu? 他们不是有“天五”吗?

他们-方位格 天五_{汉语} 有 不是 吗

(7) qol-uŋ-da dawaw,fiwan bar bol-kan-din kejin ŋyŋ-me-m-sen.

手-普称2单领属-方位格 大王_{汉语} 小王_{汉语} 有 是-过去时形动词-从格 以后_{后置词}出-动词否定形式-语气成分-普称2单

你手里有大王和小王,你不是可以出嘛。

(8) siz-niŋ ɖɣupej kəp iken! 您的主牌多啊!

您-领格 主牌_{汉语} 多 后知语气词

^① 这几位教师是维吾尔语中汉语借词使用调查的对象,他们在做问卷时都强调使用本族语就说纯本族语,说汉语就说普通话,不会使用借词。

(9) qandaq qil-i-men? fupej tygel-mi-se-Ø. 副牌没有出完，你让我怎么办？

怎么 做-现在时-1单 副牌_双 完结-动词否定形式-条件式-3单

例(5)中的 sabudo “差不多”是汉语短语临时借用，很难成为借词；例(6) - (9) 中的 tijenwu “天五(红桃五)”、dawan “大王”、jiwan “小王”、dzupej “主牌”、fupej “副牌”是专有名词，属文化词语范畴，极易成为借词。

在传统规范观影响下，为保持语言“纯洁性”，规范机构和学者期望逐渐用本族词语替代借词特别是音译借词，甚至试图用书面语词代替方言借词，对词语夹杂现象更是严格规范。词语借用和语码夹杂除受交际影响，还受制于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因为它常潜移默化地影响词语的借用和语码夹杂，这是以往语言接触研究重视不够的。

科学界定、系统描写借词和词语夹杂是语言接触研究的基础工作，以往的研究未能充分考虑无意识、有规律的词语夹杂现象。随着网络的发展和语言接触的深化，一些新的借用现象也未能引起重视。从文化交流看，以往的研究大都停留在揭示借词体现的社会、文化、生产和生活方式特点等层面，缺乏文化交际心理的探讨。借词既承载着借用语言的文化信息，特别是那些“你有我无”的借词；借词还是文化交流的“使者”，承载着语言使用者对某种事物和概念的认知及情感寄托，特别是本族语已有还要借用的词语。就此而言，借词不仅是观察民族文化交流、民族关系的窗口，还是观察语言使用者文化交际心理的重要途径。

关于语码夹杂和借词的区分，以往的界定标准主要局限于是否经过本族语音的加工改造，是否符合本族语构词规律等，但这些只是形式标准，难以揭示不同社会群体的知晓率、使用率、常用率，以及交际对象与话题、语体和场合等差异。此外，词语借用和语码夹杂除受交际影响，还受制于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和语言选择，因为语言态度和语言选择直接或间接影响着词语的借用和语码夹杂。那种从书面材料到书面材料，以语音适应、构词规律以及研究者语感作为判断标准的做法，脱离了语言使用的客观实际，以及语言使用主体即人的主观因素。事实上，传统的构词规律会因社会使用被突破，而这种突破恰恰是语言发展的动力。

(二) 借用类型和借用关系

布龙菲尔德(1980:568)把借用分为“文化借用”和“密切借用”两类。“文化借用”指通过文化交流和其他方式接触、借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成分，借用的语言项目仅限于新的外来文化事物；“密切借用”指地理和政治同一生活共同体内两种语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产生的借用现象，可以是任何事物名称。依此界定，新疆汉语方言和维吾尔语属“密切借用”类型，彼此借用涉及日常生活的不同领域。从借用关系看，布龙菲尔德认为，“文化借用”通常是相互的、双向的，只是弱势语言更多向强势语言借用；“密切借用”是单向的，弱势语言总是向强势语言借用。这一结论过于笼统。新疆自古就是多民族地区，不同地区和历史时期，不同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地位各有高低。新疆汉语方言分布范围不如维吾尔语广，使用人口少，但新疆各地自古与中央政府存在隶属关系，古代官话和现当代中国推行的普通话一直占据社会文化优势地位。新疆汉语方言与古代官话和现当代普通话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维吾尔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大多通过新疆汉语方言借入。在历史交往中，维吾尔族与使用汉语方言的汉、回等民族密切接触，语言上相互影响、彼此借用。

布龙菲尔德认为，“文化借用”主要是彼此语言中增加一些具有明显文化特征的“文化借词”。“密切借用”有多种结果：如果强势语言保持强势，便维持原样基本不受外来影响；如果弱势语言长期处于弱势，就会有大量音译、意译借词甚至外来句法进入，还有可能形成混

合语或导致一种语言消亡。我们的调查结论与该论述也不完全吻合，即无论维吾尔语还是新疆汉语方言，一直都是充满活力的语言，并未出现一方取代另一方的趋势。

（三）第二语言熟练程度和词语借用

豪根（Haugen 1950）指出，语言接触是通过双语使用者实现的，观察、研究双语者的语言使用，必然对语言借用的背景、过程、机制和特点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借用外语时，外语熟练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输入”。如果针对书面语或标准语中的借词“输入”与传播，豪根的看法或许有一定道理。然而，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双语者的语言使用既涉及书面语，也涉及口语。我们对新疆汉语方言中维吾尔语借词和维吾尔语中汉语借词的调查结论与之相反，即越是熟练的维—汉双语人，借词使用数量和场合越少、频率越低；越是维—汉双语熟练程度不高的人越容易使用借词，词语夹杂或语码混用现象也比较普遍。

在多民族地区，不同语言使用者的交往既有熟练双语人，更有不完全的二语习得者。熟练双语人在交替使用两种语言时，一般会采用第二语言标准语的表达方式，借用母语词语或表达方式的现象不如不完全二语习得者普遍，即使借用也多能在形式上摆脱母语影响。不完全二语习得者在学习目的语时，受制于母语表达习惯，更易出现语码转换或语码混杂，更多使用借词。一些不完全的维吾尔语习得者在不了解维吾尔语形态特征的情况下，词干连同附加成分一起借入汉语，或一个词语混杂两种语言成分，如“洋岗子”等带维吾尔语尊称第二人称附加成分、“海买斯”等带维吾尔语第三人称附加成分的词语形式、“胡里马唐”等汉语和维吾尔语合璧词，就是维吾尔语或汉语不完全习得者的借用形式。久而久之，这些借用形式通过口语传播成为新疆汉语方言的固定表达形式，有些甚至扩散至新疆地方普通话。

（四）借词类推和扩散

“-子”缀丰富是兰银官话的重要特征。新疆汉语兰银官话北疆片的“-子”缀比兰银官话其他片区更加普遍，主要是因为受到维吾尔语的影响。比如一些原本以[-z]结尾的维吾尔语词，借入新疆汉语方言后自然以“-子”结尾，像 pijaz “皮芽子”。维吾尔语原本不以[-z]结尾的词，也被连带带[-z]尾的尊称第二人称领属形式[ɲiz]一同借入，像“巴郎子、洋岗子”等。这些借词还具有类推功能，如：达当子（dada 父亲、大伯、大爷+ɲiz），阿娘子（ana 母亲、大娘+ɲiz），阿康子（aka 哥哥、大哥+ɲiz），阿婶子（aŋa 姐姐、大姐+ɲiz），富康子（uka 弟弟+ɲiz）。它们是不熟练的双语人在不了解维吾尔语结构特点情况下整体借用的结果。

有些早期维吾尔语借词已进入新疆地方普通话甚至全民普通话，且有较强构词能力。比如“馕”可派生出“油馕、小油馕、片儿馕、苞谷馕、窝窝馕（疙瘩馕^①）、肉馕、锅盖馕、馕饼子”，以及与“馕”有关的“馕坑子、馕房子、打馕”等。维吾尔语有大量变音重叠形式，主要表示名词泛指范畴，比如 ʃaj-paj（茶类饮品）、nan-pan（馕类食品）、palta-malta（斧子类工具）等。受此影响，新疆汉语方言也有类似谐音重叠形式。在“巴扎尔”能听到这样的对话：“一公斤多少钱？”“十五块！”“阿子麻子降一点吧！”“阿子麻子”是维吾尔语变音重叠形式 az-paz/ az-maz “少一点，稍微”的整体借用形式。朋友聚会有这样的劝酒词：“两个晚上一晚上，今天晚上一晚上，大家麻家海买斯吃好玩好把酒满上。”“大家麻家”是维吾尔语变音重叠形式 dadʒa-madʒa “大伙儿”类推至汉语的表达形式。

随着教育普及和普通话的推广，新疆汉语方言的使用群体和范围逐渐缩小，但仍有活力，

^① 维吾尔语 gerde nan “疙瘩馕”：gerde（谐音音译）+nan（音译），指“中间有窝窝的小馕”。

其中的维吾尔语借词还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和类推功能，一些借用形式甚至进入新疆地方普通话。它体现了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语言生活状况及新疆汉语方言和地方普通话特色，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语言使用者对不同语言文化的认同、吸收和兼容。

（五）对待借词的态度与借词使用的结构性差异

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常存在“言行不一”现象，即调查对象自报与其实际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不一致，或者对语言变体及其使用的情感认同、主观评价和客观认知，与其行为倾向和实际表现不一致。简言之，心理上抵触某类语言成分或表达形式，但又不自觉地使用。“言行不一”现象表面看属个体行为，但个体均具有特定社会身份，个体交际总是在特定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中完成，因此，个体语言态度体现的是群体语言态度。如果群体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就会影响语言使用以及相关的语言态度。

新疆语言接触调查表明，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感、语言规范意识较强烈。一方面，他们强调语言纯洁化，认为借词和语码夹杂是语言使用中的不规范现象。另一方面，在访谈和隐蔽观察时发现，在说本族语时，他们会不经意使用汉语借词，或夹杂汉语词，甚至使用汉语表达方式。换言之，问卷自报时，他们对待借词和语码夹杂是一种态度，隐蔽观察录音是另一种表现。自治区民语委一位民族语文干部在访谈和问卷调查时，向调查员介绍了词源学知识、语言规范化理念。由于问卷问题较多，占用了较多时间，他发牢骚说：“你不要问得太多，不然我‘肚子胀’呢！”其中“肚子胀”就是维吾尔语意译词。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一位干部在访谈间隙说：“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很多人典型的‘黑肚子’，不信你剖开看看，全是草料，找不到几个字。”这句话中的“黑肚子”也是维吾尔语意译词。“黑肚子”这个维吾尔语借词的使用，导致后续的叙述内容和表达方式也都带有鲜明的新疆地方普通话特色。

站在社会语言学立场上，对待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的“言行不一”现象，即自报“不使用借词”，访谈交流和隐蔽录音时则不经意使用借词的现象，研究者仅凭调查对象自报，难以准确判断其真实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解决“言行不一”的办法，应遵循社会语言学的“表现原则”，即以说话人实际表现而不是以其判断为准。研究者应采取多种有效手段观察调查对象的语言运用，才能获取真实客观的语料及相关的语言态度。同时，研究者不能只关注某个群体或某个维度，而应全面调查不同群体、不同维度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特点，客观描述和分析语言态度、语言行为的结构性差异。

（六）语言规范和社会使用

维吾尔语和汉语互借词语是民族交往、文化接触、语言交流的必然结果。“文化借用”具有“自上而下”特点，书面语、大众传媒是主渠道，“文化精英”是语言成分扩散的主力；“密切借用”具有“自下而上”特点，民间交际是主渠道，普通民众是语言成分扩散的主力。借词的出现和使用有其自身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普通民众的口语更是很少受语言规划影响。面对不同类型的借词，以及借词使用的社会分层和文化交际心理，研究者应采取全面观察、理性思考、深入分析的态度。

语言借用虽受借用形式、词义性质和附加色彩等因素影响，但不能忽略大众的社会使用。借词词义的引申、转义抑或泛化，都是社会交际的结果。如果有些词语及其使用会产生“负面效应”，那不是语言形式的问题，而是语言使用者社会文化层次及相应的文化交际心理使然。我们能做的是因势利导，不宜以语言规范为由，采取行政命令等手段。逆大众语言使用规律的语言规划，难以起到真正的规范作用，搞不好会造成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给民众语言生活

增添麻烦。说到底，外来成分能否进入、以什么方式进入本族语系统，适应本族语语音特点、语义和构词规律虽是衡量借词能否“安家落户”的重要指标，但不能忽略大众的社会交际和心理接受度、认同度。

参考文献

- [1] 布龙菲尔德. 1980. 《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钱晋华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 [2] 王远新. 2009-2018. 《新疆汉语方言中维吾尔语借词使用情况及语序特点调查》，载王远新主编《语言田野调查实录》(3:79-123, 5:39-74, 6:47-81, 9:101-151, 10:51-110, 11:129-174, 12:174-216, 13:33-64, 14:27-62)，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 2002. 《新疆民族语言分布状况与发展趋势》，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4] 徐思益等. 1997. 《语言接触和影响》，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5] Haugen, E. 1950. The analysis of linguistic borrowing. *Language*, 26: 210-331.

Linguistic Manifestations of Ethnic Communication: A Study on the Use of Uyghur Loanwords in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

WANG Yuanxi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six issues, which are loanwords and code-mixing, types and relationship of borrowing,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lexical borrowing, loanword analogy and diffusion, attitudes toward loanwords and use of loanwords, as well as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and language use in society. The study shows that social variations exist in the use of Uyghur loanwords in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 together with related language attitudes according to influencing factors such as speakers of different social features as well as conversational addressees, topics, language style and situation.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 gradually shrinking in speaker population and domains of use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Standard Mandarin or *putonghua*, still retains its vitality, and some Uyghur loanwords have relative strong productivity and analogical function. Loanwords not only give importance to the unique local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inguistic features under specific socio-cultural circumstances but also show from one aspect language speakers' identification with as well as absorption and inclusiveness of othe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Keywords] Xinjiang Chinese dialect Uyghur loanwords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use language attitudes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